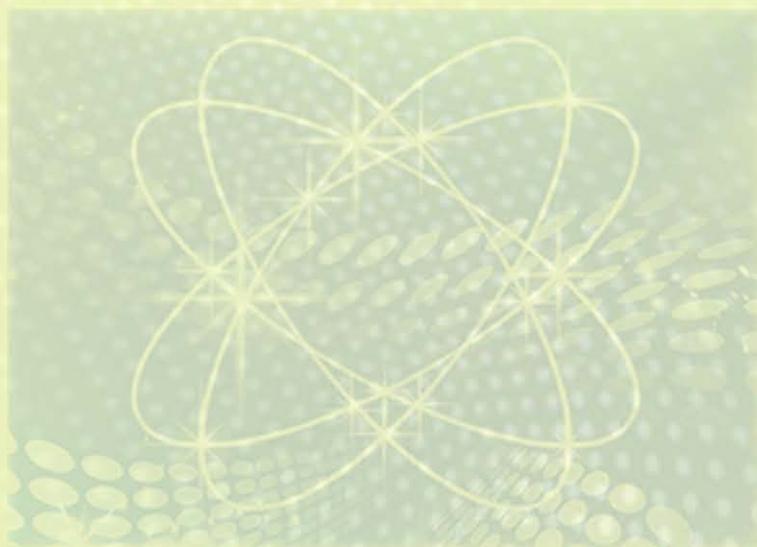


汉字与中国文化

孙永兰 编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字与中国文化

孙永兰 编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前言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早期形式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已经成熟的汉字，距今已有 3300 多年的历史。世界上其他几种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都早已终止使用，演变为拼音文字，而汉字历经几千年，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一直为中华民族所使用，这不能不归功于汉字的神奇和伟大。清代皇帝康熙就曾歌颂过汉字：“字乃天地间之至宝，大而传古圣欲传之心法，小而记人心难记之琐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观而共语，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不思而得，不言而喻，岂非天地间之至宝？”（《康熙庭训格言·养性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年版，第 231 页）今天客观地分析汉字，探赜汉字生存的奥秘，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是汉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本身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汉字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着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汉字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汉字之所以能够一直使用到今天，并将继续使用下去，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如国学大师饶宗颐所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就‘书同文’而论，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民族。同一文字的共同的历史记录、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语言交流、共同的礼仪规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统一性。这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最深层的文化基石，最可靠的精神线索。”（王永民、杨桃源《警惕拼音输入法对运用汉字能力的销蚀》，载《汉字文化》2006 年第 1 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曾高度评价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中国文化是汉字的文化，汉字的使用使中国文化受到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具有自己的特点。”（宫崎市定《中国文化的本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第 312 页）

深入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对准确把握汉字的性质和作用，了解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规律，进而使汉字更好地为中华民族服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理论探索篇，重点分析汉字的起源、性质以及汉字文化研究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下篇是文化功能篇，试图从两个大的层面来揭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即汉字与物质文化、汉字与精神文化，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汉字功能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目 录

上篇 理论探索篇

第一章 汉字的起源和性质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 一、汉字产生以前的记事方法
- 二、仓颉造字说
- 三、陶器刻符与汉字起源
- 四、汉字起源于图画
- 五、成熟的汉字——甲骨文

第二节 汉字的性质

- 一、对汉字性质的一般认识
- 二、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
- 三、汉字的性质与汉字文化

第二章 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汉字文化的性质

- 一、什么叫“文化”
- 二、汉字和文化
- 三、汉字文化的性质
- 四、汉字文化学

第二节 汉字文化研究的意义

- 一、认识意义
- 二、理论价值
- 三、工具作用

第三节 汉字文化研究的范围

第四节 汉字文化研究的方法

- 一、探寻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 二、汉字文化功能的确证

下篇 文化功能篇

第一章 汉字与物质文化

第一节 汉字与古代服饰

- 一、汉字与头衣
- 二、汉字与体衣
- 三、汉字与足衣

第二节 汉字与古代饮食

一、汉字与饮食对象

二、汉字与饮食制作

三、汉字与饮食器具

四、汉字与饮食行为

第三节 汉字与古代建筑

一、汉字字形反映出的古代建筑

二、汉字偏旁反映出的古代建筑

第四节 汉字与古代交通

一、汉字与道路

二、汉字与车船

三、汉字与桥梁

第五节 汉字与古代农业

一、汉字与农作物

二、汉字与生产工具

三、汉字与农田水利

四、汉字与耕作制度

五、汉字与粮食加工和贮存

第六节 汉字与古代工业

一、汉字与玉雕业

二、汉字与陶瓷业

三、汉字与冶金铸造业

第二章 汉字与精神文化

第一节 汉字与古代宗法

一、说“祖”道“宗”

二、合“家”为“族”

三、尊男卑女

第二节 汉字与古代婚姻

一、姓、父与群婚

二、婚、娶与掠夺婚

三、嫁、帑与买卖婚

四、姑、舅与互婚

五、媵、侄与媵制

第三节 汉字与古代民俗

一、汉字与民俗心理

二、汉字与谜语

三、汉字与祭禳

四、汉字与丧葬

第四节 汉字与古代姓名

一、汉字与名字

二、汉字与避讳

上篇 理论探索篇

第一章 汉字的起源和性质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它以其极强的生命力，记录着汉语，承载着华夏文化。虽然汉语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汉字仍以其超凡的适应性很好地服务于汉语，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汉民族的交际需要。当我们领略到汉字的神奇和伟大的时候，就不能不想探讨一下汉字的历史，揭示汉字的起源和性质。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底熔炼开始，并因文字底发明与它的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这说明文字的产生和应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换言之，文字是在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的。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除汉字外，还有古埃及的圣书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但这两种文字早已停止使用，而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间断地一直被使用至今，成为当今世界上真正意义的最古老的文字。

按照一般逻辑推理，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从产生到今天一直没有中断，那么就on应该能够沿着汉字发展的线索，逆向上溯到汉字的起源，从而揭开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

要探寻汉字的起源，就是要说明先民们是如何从没有汉字到发明使用了汉字，因此其资料必然是未经汉字记录过的，所以探寻汉字的起源是十分困难的。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甲骨文产生于殷商时期，距今有3300多年的历史。但是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具有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都已发展成熟，尤其是形声字已占到20%多，说明它已经是高度发达的文字，距汉字的产生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汉字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如何产生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文物和文献，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只能根据这些文物和文献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提出科学的假设。

一、汉字产生以前的记事方法

汉字的发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人口少，活动范围小，所以需要记载和传递的信息不多，只靠口耳相传就可以达到交际目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人口较多的氏族部落，社会生活逐渐复杂，社会交往渐趋频繁，需要记载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些信息既需要传给异地他人，又需要传到后世，于是先民们便在生活中采取了一些稚拙的记事方法。这些记事方法虽然不是汉字，其记事功能也远远不能和汉字相比，但它们对汉字的产生却起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于这些记事方法，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已有记载，但大多属传说，甚至还带有神话色彩。这些传说或神话，虽然不能作为信史来揭示汉字起源的真实面貌，但它们也绝不都是向壁虚构，它们也是历史事件的曲折反映，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这些历史传说和神话，向人们透露出一些汉字起

源的信息。下面择要进行介绍。

1. 结绳记事说

结绳记事，就是通过绳子上打结来记载和传递信息。在我国，结绳记事由来已久，早在《老子》中就有关于结绳的记载，第十八章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易·系辞》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在这里只是笼统地指出用结绳来记事发生在“上古”，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时代。而在《庄子·胠篋》中则进一步指出：“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则具体指出使用结绳记事的时代：“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这些文献记载说明，上古很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用结绳的方法来记事。到了宋代，结绳记事法仍有遗存。朱熹就曾说过：“结绳，今溪洞诸蛮犹有此俗。”严如煌在《苗疆风俗考》中指出：“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经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证，近代的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等，都有结绳记事的风俗。

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郑玄注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由于这些记载过于简略笼统，所以古人究竟如何用结绳来记事，仍然不得其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结绳记事说，因为不仅在中国，在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其中秘鲁印第安人的结绳方法尤为发达，所记载的信息也最丰富，不论是人口数量、土地疆域，还是上级命令、法律条文，都可以用结绳来记载。其方法是把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绳上，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事项，如红绳代表军事和兵卒，黄绳代表黄金，白绳代表银子及和睦，绿绳代表禾谷，等等。绳子上还可以打上不同的结，用以计数。单结表十，两个单结表二十，双结表一百，两个双结则表二百。因为结绳之法需要事先约定，所以每座城市都设有结绳官，专门负责讲解每个绳结所记之事。我国少数民族则有另外一套结绳之法，如独龙族男人远行时，就用结绳来记日，每走一天，就打一个结；当朋友约定相会或宴请的日期时，就按其天数先在一根绳上打若干个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绳结解尽，既是相约的日子。另据李家瑞《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傈僳族一个叫黑燕麦的人抚养其侄儿，从侄儿到他家开始，每过一个月就在涂墨的麻绳上打一个结，共打结 51 个。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侄儿参加了工作，他便凭这些绳结向侄儿讨要 51 个月的生活费。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都是为了记载和传递信息，克服人脑在记忆时间和记忆容量方面的有限性。因此可以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但是与文字相比，结绳的可区别度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用颜色的差异来记载事情的不同，即便像秘鲁土人结绳记事的方法最发达，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信息的功能仍是很低的。

但是，结绳记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作为一种视觉记事符号，突破了语言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创举。它虽然没有直接演变为文字，但在功能上已与文字有相同之处，为人类最终创造文字起到了启迪作用。

2. 刻契记事说

作为古代的一种记事方法，“刻”和“契”意义相同。东汉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这说明刻契的作用主要是用以计数。唐兰先生也曾说过：“因为数目在记忆上是最困难的。尤其是人们的契约关系，两方的记忆也许不同，数目是最容易起争端的，所以得刻木来做一种信约”。（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用刻契来计数，在我国一些古籍中也时有记载：

《周礼·地官·质人》：“掌稽市之书契”。郑玄注：“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

《管子·轻重甲》：“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墨子·公孟》：“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魏书·帝纪叙》：“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

不仅中原地区如此，古代其他少数民族亦有刻契之俗：

《隋书·突厥传》：“无文字，刻木纪契而已。”

《旧唐书·南蛮传》：“俗无文字，刻木为契。”

除此之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刻契记事由来已久。1976年在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村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出土了四十多枚大小相等的骨片，均长1.8厘米，宽0.3厘米，骨片的中部一边或两边分别刻有一至三个缺齿。今天虽然已经难以考证这些缺齿所代表的具体内容，但它们足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确有刻契记事之习俗。另据安特生《甘肃考古纪》记载，在甘肃省西宁县的仰韶文化遗址里，曾发现很多长方形的骨板，其中就有被刻画过的。经考证，这些刻画就是用来计数的。其计数方法有二：一是用刻齿的方法，或在一块骨板的一侧刻两个缺齿，或在一块骨板的两侧正中各刻一个缺齿，现尚不能确定其意义；二是在骨板上刻上线条，有的很像古文字里的“五”和“六”。

这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已经向人们透露出，在汉字发明之前的远古时期，先民们通过在竹、木上刻齿来计数。这种刻契之法在现代边远少数民族中仍有使用。蒋善国先生在《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他转引了陆次云《峒溪纤志》：“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信约之验。”诸匡鼎《瑶壮传》：“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纪闻》：“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武汉古籍书店，1987年版，第12页）

至于古代如何使用刻契来记事计数，文献资料中并未详说。今天我们通过考察某些少数民族的习俗，约略可以推测出远古时代刻契的用法：

一是用刻齿来记数，这是刻契的最主要作用。如景颇族男子远行，每走一天，就在刀柄上刻一横道。独龙族人则用削平刻齿来提醒约会的日期，方法是：二人约好几天后见面，就各取一木片或竹片，分别刻上几个缺齿，每过一天就削去一个缺齿，当缺齿全部削平，则约会日期已到。独龙族人还用这种办法来记载自己借给别人多少钱，借多少钱就在木片上刻多少齿，钱还了就削平刻齿。

二是用刻齿来记事。这在古代是几乎没有的。按照景颇族的习俗，每逢庄稼收获，老人便向本村寨人讲述与别的村寨人的冤仇。老人取出记事的木刻，大缺齿表示大纠纷，小缺齿表示小纠纷，至于每个缺齿的具体内容，只有刻契者才知道。

三是用刻契作凭证。新中国成立前红河哈尼族农民向地主交租，就在一个竹片或木片的两侧按交租的重量刻上缺齿，然后从中间剖开，农民、地主各执一半作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做法，而且质地不一定是竹木。《史记·魏公子列传》：“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这就是发生在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公子窃符救赵的故事。古代的兵符为铜制，作虎形，故又称虎符。背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留存国君处，左半发给统兵的将帅。调发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

二、仓颉造字说

前面所介绍的是前文字时期，先民们是如何记事进行交流的，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记忆、进行沟通的作用，但它们不可能演变为文字，只是刺激着人们在寻求更科学、更有效的记事方法。

下面所要介绍的是关于创造汉字本身的传说，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是仓颉造字说。关于仓颉造字，文献中多有记载。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

《四体书势》：“昔在皇帝，创制万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

居延汉简《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诣。”

这些记载不仅认为确有仓颉其人，而且指出汉字就是仓颉（还有沮诵）首创的。

与此相呼应，文献中又有了关于仓颉的相貌的传说。

王充《论衡·骨相》：“仓颉四目。”

《仓颉庙碑》：“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姓作宪。”

《春秋元命苞》：“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岗。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

《春秋演孔图》：“仓颉四目，是曰并明。”（《太平御览》卷366引）

《书断》：“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太平御览》卷749引）

这些传说都把仓颉描写成长有四只眼睛的神奇之人，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人们认为首创汉字是一件神奇之事，一般人不可能有此才智，于是《汉书·古今人表》就把仓颉列为人类九等中的第三等智人之中。

关于仓颉是怎样造字的，古代文献中亦多有记载。

《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王充《论衡·奇怪》：“仓颉作书，与事相连。”

《春秋元命苞》：“仓颉史皇氏，名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蔡邕集·篆势》：“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

许慎则说得更为详细，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以上文献记载，言之凿凿，确信首创汉字者为仓颉。不仅如此，有的还描绘出仓颉造字这一惊天动地伟大创举所产生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

《淮南子·俶族训》：“仓颉之始作书，以辨治百官，领理万物。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又《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饥饿，故为雨粟，鬼恐为文书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豪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

至明代《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世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更将“鬼夜哭”的传说演绎得酣畅淋漓，字里行间流露出封建文人对文字既崇敬又畏惧的复杂心情：“话说上古仓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那

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

《路史·前纪》六盛赞仓颉造字：“以正君臣之分，以严父子之仪，以肃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礼乐以兴，刑罚以著；为政立教，领事办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蕴尽矣。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今天我们科学、客观地分析、评价仓颉造字说，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在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中，存在大量异体字，笔画可多可少，偏旁可甲可乙，字体可正可倒。这说明汉字绝非出于一人一手、一时一地。另外，历史上是否确有仓颉其人，至今仍无定论，即使确有仓颉其人，他也只是起到了搜集整理汉字的作用。《荀子·解蔽》即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近人章太炎在《造字缘起说》中对此阐释说：“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书者，……夫人具四肢官骸，常动持筵画地，便已纵横成像，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待仓颉也。”

不论历史上是否确有仓颉其人，也不论汉字是否仓颉首创，仓颉造字说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向人们昭示出一些汉字起源的道理。

首先，这种传说把仓颉造字与结绳记事联系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记事之法已不能满足更多更快地记录和传递信息的社会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研究探索一种新的记事方法，创造出具有丰富信息内涵、具有更好区别度的符号，以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在“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情况下，先民们从鸟兽蹄迹之迹中“依类象形”，“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逐渐创造了汉字，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众所周知，文字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此时“庶业其繁”，社会即急需一种优于结绳等记事方法的更好的办法，即汉字。同时，又需要能够掌握运用汉字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巫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直接并大量使用汉字、与汉字关系最密切的人。这可以从“史”的古文字写法以及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得到证明。既然“史”与汉字关系最为密切，那么说仓颉曾规范整理过汉字应该是可信的。

正因为古人确信仓颉首创了汉字，功劳巨大，受到人们的景仰，所以史书多有附会其生活地点、造字之处、墓葬之所的。

《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河图》曰：‘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阳虚即在今陕西商洛地区境内。

《九域志》：“今长安城西南二里宫张村有三会寺者，记为仓颉造书之堂”。

唐岑参《题三会寺仓颉造字台》诗：“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

在历史记载中，仓颉不仅曾生活于阳虚山，造字于阳虚山，而且在今山东、河南开封各有仓颉造书台。

《春秋元命苞》说仓颉“都于阳武，终葬衞之利乡亭”。阳武，乃今陕西白水县一村名，被认为是仓颉出生地。今《白水县志·艺文》中还有一首诗，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仓颉的景仰之情：“史官村外柏成行，仓圣坟祠古利乡。碑蚀苔痕迷鸟迹，像衣木叶尚羲皇。精英自泄乾坤迷，典册因垂日月光。四目开天先首出，至今苹藻有余劳。”

《太平御览》卷560《礼仪部·冢墓四》引《皇览冢墓记》指出：“仓颉墓在冯翊卫县利南亭南道旁，坟高六尺，学书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绝”。今白水县史官乡史村有仓颉庙，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庙中有仓颉的墓冢，高4、5米，周长48米。（见李广阳《仓颉·仓颉庙》，《文史知识》1989年第6期）实际上仓颉的墓地不止一处，陕西白水县，山东寿光县、东阿县，河南开封、南乐县都有他的坟墓。仓颉庙也不止一处，不仅白水等地有，连杭州也有，原址在杭州市吴山顶上，清代俞樾还为此庙撰写了一幅62字的长联，颂扬仓颉造字的功绩。甚至把仓颉当神来供奉，成为胥吏

祖法的“仓王”。

三、陶器刻符与汉字起源

众所周知，甲骨文已是十分成熟的汉字体系，因此它距离汉字的产生肯定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李先登等人曾认为汉字可能产生于夏代，作家骆宾基通过对金文的研究考证，认为汉字产生于公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之间，其观点与唐兰等人近同。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还没有找到可以证明为文字的确凿资料。

要探讨汉字的起源，最重要的依据是考古发掘。根据唐兰、李先登的研究证明，说汉字起源于夏代初期是可信的，其根据是：

第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证明，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政令需要记录和传递。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以及军队、监狱、刑法等等，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创造和使用汉字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第二，各种记事方法以及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经过了自上古以至龙山文化的发展，已经相当丰富和多样，抽象性的线条符号和形象化的标记图像均已具备，加上形形色色的族徽，已为文字的创作准备了大量的素材和可资借鉴的资料，汉字产生的条件业已成熟。

第三，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一些形体与甲骨文、金文相类似的刻画符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掘出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片。这些刻画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虽然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与汉字有关。

第四，古代典籍的记载也印证了夏代已有汉字的推断。如《太平御览》卷 618 引《吕氏春秋·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说明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另外《世本》、《史记》等有关夏商两代世系、年代和史事的记载，据以李学勤为首席科学家的夏商周断代研究证明，基本是准确的、可信的。同时夏代已有若干详细的历史传说流传下来，如彝器刻辞里称述夏禹的功绩，孔子称述尧舜和禹的事迹，孟子称述尧舜到孔子的年数等等，都可以证明夏代大概已经开始进入有史时期。因此司马迁才能够那样完整地记述夏代的世系。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到夏代，既产生了创造汉字的迫切需要，又具备了汉字产生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当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已有了一些专事脑力劳动的人，于是就很有可能创造出了汉字。

此外，我们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历史，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窥见一些汉字起源的蛛丝马迹。如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挖掘出有刻符的陶器 113 件，有刻符 27 种。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 16 件，上面有刻符 18 个。这些刻符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十分相似。郭沫若先生认为：“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画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四、汉字起源于图画

上面介绍了前文字时期的记事方法以及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尤其是具有“中国文字的孑遗”性质的陶器刻符，向人们传达出汉字起源的些许信息。

结绳记事和刻契记事虽然启示人们去探寻进行交际和传递信息的符号，但它们本身毕竟不是文

字，陶器刻符虽然向汉字迈进了一步，但它们的表意功能太差，与汉字的起源还有一段距离。那么汉字的直接源头是什么呢？——图画。唐兰先生指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又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周有光先生也曾经指出：“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另一方面成为文字。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创造出许多种原始文字，原始文字都不能完备地按词序记录语言。有的只有零散的几个符号，有的是一幅无法分成符号单位的图画。有的只画出简单的概念，不能连接成句子。有的只写出实词，不写出虚词，要读者自己去补充。”（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能使交际双方达到认识与理解上的默契。同时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又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

说图画是文字的源头，并不是说文字是直接从图画演变来的，这中间还经历一个文字画的过渡阶段。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曾经用画图画和作图解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通常把这种图画和图解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按照‘文字’的狭义用法来看，图画文字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文字画这个名称可以采用。文字画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图画，而不是图画形式的文字。”（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页）用图画来传递信息，靠的是绘画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图画画得越细致、越形象，所传达的信息就越丰富、越准确。但是，用图画传递的信息无论多么丰富和准确，对于接受者来说，这些信息仍然是粗疏的、大概的，甚至见仁见智。当用这种图画频繁传递信息，就会使某一图形与某一意义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形义关系出现了约定性，这便形成了文字画。

但是文字画所表现出的形义关系，仍然不是与语言相对应的，其主要表现和本质特征是，人们虽然能理解其意义，但不能用语言中的词读出来。因此说文字画是从图画演变为文字的过渡形态。

由文字画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成为早期的象形文字。其本质特点是：图画已经脱离了任意理解的阶段，具有了固定的意义和读音，能够记录语言中的词，做到一形即一词，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正如汪宁生先生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文字从表音开始，具体来说即表音的象形文字才算最早的文字，在此以前出现的任何符号或图形，都只能算原始记事的范畴。”

从用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文字画，再由文字画发展为约定俗成的记词符号，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汉字的起源过程。这还可以以我国古代岩画为旁证。盖山林先生在《阴山岩画》中指出：阴山岩画“图像的具象性很强，往往追求所画对象形态的逼真。而后逐渐趋于程式化。……再向前发展，便走向抽象化符号化。……古突厥文字母，便是由符号化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化而形成的。”（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第364页）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考古发掘的文物中，还没有发现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文字画。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陶器刻符，其时代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4000年，这就是目前所能确定的汉字起源的上限时间，在经历了大约2600年的时间之后，原始汉字才发展为成熟的汉字体系——甲骨文。

五、成熟的汉字——甲骨文

汉字发展到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汉字了。因为这些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习惯上称它为甲骨文。因为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所以又叫殷墟文字。从内容来看，甲骨文大多是占卜的记录，所以又称卜辞或甲骨卜辞。从写法来看，甲骨文大都是用刀刻的，所以又称契文或契刻文字。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据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记载：“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钱、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故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甲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多，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除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填枯井。”这段话说明甲骨文的发现，实属偶然。且当时误认为是龙骨，而且没有重视甲骨上刻的文字。直到 1899 年，甲骨上的文字才真正被人发现并引起重视，这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据说 1899 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请太医为他治病，太医在诊脉后给他开了一张药方。王懿荣当即让其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买药。家人买回药以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仔细察看，无意中发现有一种叫“龙骨”的药，上面刻着一些似字非字的刻画。因为王懿荣擅长金石学，精通铜器铭文，对古文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所以他意识到这味所谓的龙骨，不是一般的药材，其中定有奥秘。于是他保存起这些“龙骨”，随即派人到药店了解“龙骨”的来源，并买回药店里的所有“龙骨”。这件事在当时文化界引起很大轰动，尤其是不少研究历史的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查，北京各药店的“龙骨”，都是从河南等地的药材贩子手中收购来的，而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犁地时偶然发现的。由于农民不知道它的真实身份，就以为是中药龙骨，于是就作为药材卖给了药材贩子。王懿荣得到“龙骨”后，对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初步断定它不是什么“龙骨”，上面所刻的刻画，是比当时已知的各种古文字还要古老的一种文字。从此，“龙骨”被剥去了神秘的面纱，举世闻名的商代甲骨文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会被人们发现了。

此后，公私发掘甲骨不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甲骨文发现到现在，出土的甲骨约有 15 万片。目前汇集出土甲骨片最精、最完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甲骨文合集》，收集单字最多的是考古研究所在孙海波《甲骨文编》基础上编写的修改本，共收录单字 4672 个，其中中编收已识字 1723 个，附录收未识字 2949 个。

甲骨文的发现，对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对研究汉字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汉字的性质

一、对汉字性质的一般认识

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

一是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

二是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50~51页）在传统的语言研究中，包括在汉语的教学中，都习惯上把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体系的文字，可以英文为代表；一类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可以汉字为代表。这种对世界文字的分类以及对汉字性质的界定，近年来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

要界定一种文字的性质，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标准。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以形体符号与语言建立联系的，因此要界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其标准就是这种文字形体符号和它所记录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而语言有语音、词义、语法三要素，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与语音和词义的关系，即这种文字形体符号是记音还是表意。正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页）

根据符号学理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偏旁是文字（汉字）的符号。这些符号具有层级性。也就是说，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作为文字的符号的偏旁，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必须把这二者区分开来。

就汉字来说，构成汉字的偏旁可分为三种：一是意符，指与汉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偏旁；二是音符，指与汉字所代表的词在声音上有联系的偏旁；三是与汉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和声音上都没有联系的偏旁。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不同时期的汉字，其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早期的汉字中，如甲骨文，形声字只占20%左右，其他为象形字、会意字和少量的指事字。而构成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偏旁，都与这些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所以它们都是意符。即使是形声字，其形符也是表意的，因此说这个时期的汉字是表意的，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的结构和形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形声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已占90%以上，后造的字基本上都是形声字。二是字形演变之后，原本通过象形来表意的意符，已经看不出其表示的意义了，这时意符便成了纯粹的记号。如果仍然把这个时期的汉字称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则明显与事实不符。

二、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

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优势，一个汉字读为一个音节，记录一个语素，也是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古汉语中的单音节词往往成为现代汉语双音节词中的一个语素。于是可以说，汉字是记录语素的。

如前所述，构成汉字的符号可以分为三种，即意符、音符、记号。其中意符与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意义相联系，记号则起到把代表不同语素的汉字区别开来的作用，二者都是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符号。

音符则比较复杂。一是作为形声字的一部分——表音符号，记录的是整个音节，即是该音节的符号。二是用来记录多音节的单纯词，如联绵词、音译外来词的假借字，它们原本也是表意、记录语素的，但此时却失去了表意功能，只起到记录音节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古代汉字还是现代汉字，着眼于意义，它们记录的是语素，着眼于读音，它们记录的是音节。因此说汉字的性质是语素——音节文字。

三、汉字的性质与汉字文化

作为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汉字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的圣书字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与汉字的性质是分不开的。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字相比，汉字的突出特点是表意，这也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所在。“而究至源，汉字的特点又在其‘形’与义有着有机的、合理的关系。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汉字的‘形’是一个整体，并直接与义发生联系，人们可以根据汉字之形联系到意义；而西方拼音文字的‘形’却只是一些零散的记音符号，它只有在完整地记载了一个词的语音组合单位以后，才与义发生联系。”（苏新春主编《汉字文化引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早期的汉字，如甲骨文、金文，以其独有的表意方式，更形象地再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如“为”字告诉我们，在远古时期的中原大地上，大象曾经像今天的牛、马一样帮助人们耕田。“监”字告诉我们，在没有发明玻璃镜、铜镜之前，先民们是用器皿盛上水当做镜子来照影的。“车”字则形象地再现了远古车的单辕形制，与现代双辕车的形制迥然不同。而“姓”字从“女”及许多早期姓氏多从“女”，又说明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

同时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由于汉字是二维结构，即方块形，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是线形结构，所以千百年来，由汉字的形体生发出一种民族艺术——书法。书法艺术是汉字所独有的艺术，是其他文字所没有的。一代代书法大家，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真、草、隶、篆书法真品，成为愉悦后人的精神食粮。

与书法相伴而生的还有篆刻，这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它既有实用性，如官、私印章，可起到证明和身份的作用，又有观赏性和艺术性，这也是其他文字所不具备的。

第二章 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对汉字的研究由来已久。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汉字的结构分析入手，阐释汉字的意义，奠定了汉字研究的基础，成为汉字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的历朝历代，汉字研究绵延不绝，大家辈出，成果斐然。但总括起来说，古代的汉字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结构达到说解字义的目的，最终为读经服务。

到了近代，尤其是 20 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对汉字的研究，由注重意义的研究转变为对汉字功能的研究，于是怀疑、否定、批判汉字之风兴起。不论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都视汉字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羁绊，如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一样，成为落后的象征。甚至把国家的衰败、国力的孱弱、科技的落后、经济的迟滞、教育水平的低下、民智的愚蒙，统统归于汉字。因此主张改革汉字，提倡拼音文字。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钱玄同就曾愤怒声讨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先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的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就连鲁迅先生也是极力否定汉字的，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二三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又说：“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汉字与拉丁化》）甚至喊出了当时汉字改革的最强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对汉字持否定态度的人，着眼点只放在所谓的“四难”上，即汉字由于数量过多、笔画过繁、结构复杂而难读、难写、难认、难记。“四难”确实是汉字的缺点，但这恰恰又是汉字特点的一个方面。汉字为什么从产生之日起，一直不间断地使用到今天，必有其内在原因，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汉字之所以没有消亡，其根本原因就是它非常适应于汉语，本身又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拼音文字所无法比拟的。正如徐德江先生所说：“汉字长期受到种种冲击，特别是受到百余年来拉丁化的世界性、毁灭性的凶猛冲击而不倒，除其他原因外，最根本的是汉字本身所具有的适应汉语‘明确简约’的科学性使然。”（徐德江《浅谈文字语言——1981 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中主要学术观点综述》，载《汉字文化》2005 年第一期）

即使在否定汉字的时期，我国的汉字研究仍取得了许多成果，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郭沫若、胡厚宣等人的甲骨学研究，都在以字考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字的作用和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实事求是的科学之风对汉字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开始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汉字进行研究，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开创了汉字研究的新天地。

第一节 汉字文化的性质

一、什么叫“文化”

要研究汉字文化，首先必须确定汉字文化的性质，其核心是什么叫“文化”？

对“文化”的解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克

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从 1871 年到 1951 年，关于“文化”的定义已达 164 种之多。正如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所说：“文化，文化，言之固易，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可见给“文化”下定义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在我国，“文化”作为一个词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指美、善、德行。“化”，本义指改变、造化。到了汉代，“文”和“化”开始连用，构成“文化”，但此时的“文化”仍是两个词。如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很明显，这里的“文化”是指用文德来教化，是一个偏正短语。到了晋代以后，“文化”开始演变为一个双音节词，但意义仍与今天不同。如《文选·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文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指文德、文治，与“武力”相对称。

今天的“文化”一词，是意译外来词，《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了这个词，并解释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58 页）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一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张岱年、方克力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 页、第 5 页）本书对汉字文化的研究，取“文化”的广义概念，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汉字和文化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记录着汉民族的知识经验，并一代代流传下去，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永久得以保存。这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所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文化与科学》，浙江出版社，1988 年）怀特所说的符号即文字。文字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永久性，它把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都记录下来、流传下去，因而成为人类文化的“活化石”。

汉字和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汉字是文化的产物，二是，汉字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先说汉字是文化的产物。汉字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与之相比，人类的历史则长得多。人之所以成为人，其重要条件是有语言、会思维、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正如法国人类学家施特劳斯所说：“文化这个概念起源于英国，因为是泰勒首先将之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的整体’。因为文化关系到人和动物之间的特定的区别，并因此导致了自古以来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古典对立。有鉴于此，人主要是作为匠人或‘工具制造者’问世的。”（《结构人类学》中译本，第 385 页）

中西方对人与动物的区别，着眼点不尽相同，我们着眼于人类的语言、思维、制造和使用工具，而西方则着眼于技术能力、物质创造和工具创造，而汉字的发明正是技术创造的表现。说汉字是文化的产物正是基于此。当“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旦会制造工具，又产生了语言，就已经是‘文化的人’了，但还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还没有进入文明的境界。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技术进一步革新，城市出现了，文字诞生了，‘文化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何久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3 页）